

# 坚信马列 忠于真理

## ——学习和继承李达同志的革命精神

宋 镜 明

今年10月2日,是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李达同志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和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我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值此李达同志诞辰百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的不朽的历史功绩,正确评价他的光辉一生,探讨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学习和继承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无论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都是很有意义的。

### (一)

“忠实于真理”、“始终为共产主义而战”,这是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的战斗誓言,也是他终生信奉的最高准则。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矢志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十月革命以前,李达同志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他逐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是李达同志和当年许多先进分子共同的思想历程。他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他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毕生的信念。即使在国民党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他丝毫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仍然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及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与第四国际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这些论战都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李达同志除了第一次论战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在后来的论战和批判中,他一直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当年,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几千年的国度里,在国家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的中国大地上,李达同其他共产主义先驱者一道,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之光,从而促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固然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关，但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胜利成果。李达同志就是他们中间的重要一员，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积极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他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我党早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宝贵贡献。<sup>②</sup>

李达同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sup>③</sup>一度在组织上离开过自己曾积极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但他仍然与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李达同志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候补期，便是对他解放前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也是他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最终归宿。

##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同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他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率先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杰出战士，是著名的无产阶级“红色教授”。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通过种种渠道，企图引诱他去给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当顾问，他一口回绝，并愤怒地说：“要我做侏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sup>④</sup>“一个月给我一千元大洋，我也不干！”<sup>⑤</sup>汪精卫、陈公博企图拉他加入国民党改组派，他也坚决拒绝了。然而，李达却和许德珩、邓初民、张庆孚、施复亮、钟复光、黄松龄等同志发起组织“本社”，以“不忘本”、“保持革命之本”<sup>⑥</sup>自勉，共同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28年，湖南省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悬赏缉拿“著有现代社会学”的“著名共首”李达同志。他泰然处之。是年冬，李达还和友人邓初民、熊得山、张正夫、熊子民合作创办昆仑书店，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首先重印了《现代社会学》的修正版。昆仑书店以后还陆续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政治经济学批评（判）》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在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方面它起了带头作用。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曾先后颁布了《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及《宣传法审查标准》。反革命文化“围剿”，使上海一些比较进步的书店难以存在。编辑、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书籍尤为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李达同志用“王啸鸥”的名义创办了笔耕堂书店。这是一个用来冲破反革命文化“围剿”、对付国民党反动当局书报检查的挂名书店。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同志一个人。他自己出钱、自己买纸、自己托人代印，然后署上笔耕堂书店这个空名，再找人把进步书籍推销出去。李达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而又巧妙地继续出版被列为禁书的《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李达同志在白区的一些大学当教授，他把大学当作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勇敢地向进步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实际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征途。“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横遭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被打断，住院治疗达7个星期之久，右臂仍不能动。特务以为他的右手已经残废，不能再写作战斗了，高兴得眉飞色舞。然而李达同志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极端蔑视，毫无畏惧，坚毅地表示：“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和好手一样。”<sup>⑦</sup>他出院后，一面以顽强的毅力锻炼手臂，恢复动手写作的能力，一面又继续利用讲课

和学生个别来访，宣传革命理论。

李达同志从上海解聘转到北平应聘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以及朝阳大学教授后，继续开设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类课程，使这些大学的文法科讲坛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他也因此和黄松龄、吕振羽、齐燕铭、侯外庐同志一道被誉为北平五大著名“红色教授”，而以他为首。

李达同志是“进步师生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sup>⑧</sup>。吕振羽同志后来谈起这件事非常高兴地说：“我们因此也就得以占据(大学)这块阵地，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sup>⑨</sup>李达同志极力支持吕振羽同志反对蒋介石的理论顾问陶希圣。他对吕振羽说：“现在各派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要看清楚哪些是最凶恶的，对准目标，保卫马克思主义。”吕振羽说：“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达说：“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一个最危险的人物，我们要和他斗争。”<sup>⑩</sup>李达还支持吕振羽参加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亲自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作序并推荐给人文书局出版。

当年，北平同上海一样，李达同志经常遭到宪兵、特务的监视和跟踪，处境很艰难。他常常戴上大口罩，躲避敌人的视线。他始终保持革命艺节，坚决不与胡适、陶希圣、蒋梦麟之流发生任何往来，更不参加替反动派涂脂抹粉的应酬活动。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威胁、恐吓，一笑置之。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和毛巾、牙刷，随时准备坐牢。还做了大皮袄，准备寒冬腊月监狱里坚持写书。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通过冯玉祥做说客，想请李达和白鹏飞当国民党行政院参事，企图以此拉拢他们。蒋介石还以“上宾之礼”邀请他们去庐山会见。但李达斩钉截铁地立刻回绝：“我们只知道教书，不知道做官！”<sup>⑪</sup>所以，后来邓初民先生高度评价李达说，李先生“立身处世，心有所主；不为富贵、贫贱、威武世俗之物所摇撼，实有足多者。”<sup>⑫</sup>

抗日战争期间，李达同志在日军的追捕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迫害之下，受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和宣传。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李达同志对吕振羽同志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决不失节的。”<sup>⑬</sup>反动当局对他软硬兼施，他都嗤之以鼻，丝毫不为所动。李达说：“我是有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地改变立场，抛弃信念是难上难。”<sup>⑭</sup>他在困境中坚持著述，甚至躲避敌机轰炸时还带着手稿。

1947年初，李达同志到湖南大学任教。湖南省反动当局惧怕他宣传马克思主义，有意刁难，不许他讲授自己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授法理学，以为这样可以封住李达同志的嘴，或者迫使他就范。他据理抗争并且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学者，我要按自己的体系讲”，“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在法理学讲授中，他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法律现象，以巧妙的方法抨击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学校当局对他规定“三不准”：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讲演，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并把他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但李达同志仍然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在这年5月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他对来访的进步学生公开表示：“国民党反动派不垮台，人民就要遭殃！”1948年，湖南大学举行形势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中国非改革不可的长篇讲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 (三)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为了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德育放在首位，注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它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一环，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资本主义大学的一个显著标志。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李达同志历来是很明确的。在武大就职典礼上，他就号召干部教师团结一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办好武汉大学。

李达同志从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深刻地认识到：改造旧大学要靠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器，建设新大学也是一样。他认为，要办好高等教育，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那是不可能的。师生员工只有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才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才能把学校办好。因此，李达校长一到武大，就亲自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并兼主任，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随后，他又创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组织教师和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校一些老教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他教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培养理论队伍，1956年9月，李达校长重新创办了武大哲学系，也亲自兼任系主任，自编教材，为学生讲课。1959年2月，武大成立了以李达校长为首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四个教研室，并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兼任各教研室主任。同年7月，李达同志发表《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的专文，密切联系当时的实际，深入分析了专业理论工作的落后状态，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若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指导，是不能做出成绩的。理论工作者是如此，实际工作者也是如此。因此，他强调：“为了迅速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适应飞跃发展的形势的需要，有必要掀起一个理论学习的高潮。”<sup>⑤</sup>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李达同志出于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极端信奉，同时也由于自己对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简单化认识，曾经参加了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适思想和梁漱溟思想以及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写过一些反对所谓右派的文章。这些批判虽然打上了不可避免的时代印记，但是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尤其是作为胡适思想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的批判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通过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从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志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研究的同时，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达充满着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人民利益而献身的强烈感情，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只知道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他经过深刻反思和冷静思考，很快就发现并抵制了思想理论上“左”的干扰和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自觉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

1958年，当有人片面夸大群众学哲学的成绩，否认和贬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重要性时，李达同志并不因为有的领导人支持这种做法就盲目地赞成，而是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对于当时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提出的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否定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错误主张，李达同志也采取了批评和

反对的态度。当年，有人按照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调子，在“大跃进”中，片面鼓吹“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极力贬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说它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针对这种论调，有人写了一篇《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的文章，从理论上维护按劳分配的原则，准备在《理论战线》上发表。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不能发表，李达同志则指出：“讲按劳分配为什么不对？社会主义不讲按劳分配，讲按需分配？”坚持在《理论战线》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当时的混乱，李达同志又作报告又写文章，反复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反对降低共产主义标准。强调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规律，说明还必须进行商品的生产 and 交换，承认和保护资产阶级权利。

李达同志坚决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他尖锐指出：“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共产主义就会搞成破产主义，大跃进就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就会变成人民空社。”<sup>⑥</sup>1959年，庐山会议刚结束，他在青岛闻讯后立即明确表示当时应当反“左”，不应当批“右”，并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不会是‘反党集团’。”<sup>⑦</sup>1961年8月，李达同志在庐山当面向毛泽东主席痛陈了自己对“左”的错误看法。接着，他于第二年年底，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亲自去湖南零陵调查，仔细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情况，严肃地批评了“共产风”造成的严重后果，再次明确表示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就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零陵县委和湖南省委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对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李达同志更是极力反对。他认为“拔白旗，插红旗”这样的“革命”，是“混淆矛盾的性质”、“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发动学生编教材，放“卫星”，与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打擂台”，是“瞎胡闹”。他说：“怎么打擂台？学生总还是学生嘛，他还不懂，怎么打？”当时有人提出要打倒牛顿和爱因斯坦，他觉得好笑，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李达同志对这些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痛心，在1961年的武大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大声疾呼：“几年来专搞运劳，单打一，打乱了教育秩序，要马上改。”<sup>⑧</sup>

对于一切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理论和错误行为，李达同志不仅敢于在下面坚持真理，随时提出批评并抵制，而且常常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1961年，李达同志在庐山亲自就1958年以来，地方上发生的严重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了详细汇报，充分表现了他对党的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李达同志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60年代开始，他就同林彪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林彪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工农兵学哲学”的名义下，散布了一系列反马列主义的谬论，诸如学习马列主义可走“捷径”，记住几个条条就行了，讲系统性、逻辑性就是脱离实际，只要背几个“警句”，就算“活字活用”融会贯通了，如此等等。对于林彪鼓吹的这一套，李达同志坚决反对，严肃指出：“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写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不能不讲逻辑性，联系实际也不能生拉硬套，不要赶热闹，要有科学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能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总有一个来龙去脉嘛！”<sup>⑨</sup>李达同志还批判了林彪所谓“毛泽东思想处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言论，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讲深讲透，但要实事求是，不能牵强附会。提出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要讲

得合乎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被淹没了。

1966年2月，李达同志从北京又回到武汉。在这之前，1965年夏天，李达同志由武大调到北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负责抓全国的法律工作。为什么李达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已经闻到了的时候回到武汉来呢？原来在1月25日，他从报纸上看到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论述，顿时寝食不安。他想：顶峰，意味着终止，到了顶峰，不是再没有发展了吗？这显然是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谬论如果任其流传，马列主义的真理将被阉割，社会主义的是非会被颠倒，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它以歌颂毛主席面貌出现，欺骗性、危害性就更大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要落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上。怎样澄清和戳穿这个谬论呢？想来想去，李达同志觉得只有在自己那本未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里作文章了。于是，他决定回武大来，同助手们一道来完成这项任务。

林彪因提出“顶峰论”，一下就升到一人之下，亿人之上。跟这位“九千岁”唱“对台戏”，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家人都极力反对。李达同志回武大写字的决心却不动摇。他说：“我今年76岁了，离天的时间远，离地的时间近，必须抓紧有限的时间，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在武汉，“顶峰论”比北京喧嚣得更厉害。李达同志感叹不已，他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歪曲而惋惜，为国家的前途和党的命运而忧虑。他心里苦闷极了。好象胸膛里装满了火药时刻要爆炸。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嫉恶如仇，不容邪恶。激动时每不能自制，触讳犯忌，在所不顾，常招致灭顶之灾。面对政治迫害，从容自若，也不改本色。一次审查助手写的《大纲》下册提纲的附件，那句刺眼的词句，又跳进李达同志的眼帘：“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同志象触电一样，全身震动了一下，怒气冲冲地说：“什么顶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我们不要写这个！”助手跟着李达同志已经多年了，老校长如此发火，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是这火能发吗？他的助手怕惹出祸来，悄声说：“李老，这句话是林彪同志说的呀！”听了助手的解释，李达同志更火了，他激动地说：“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怎么能有‘顶峰’呢？这个说法不科学，不管谁说的都一样。”为了帮助手们在斗争中提高哲学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李达同志教育大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如果到了‘顶峰’就没有发展了！”<sup>②</sup>他认为，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人，表面上是歌颂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歪曲毛泽东思想。

由于李达同志坚决抵制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他就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叛徒”、“地主分子”等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接着掀起了“愤怒声讨李达黑帮”的狂风恶浪。但李达同志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心仍然向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然坚持不懈地要写他的《大纲》，把它作为考验自己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纯洁性的场所。当他的全部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的时候，他悲愤地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拼了这条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把书写完！”他还嘱咐夫人：“我如死去，请转告陶德麟等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还说：“等运动结束了，我们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sup>③</sup>多么铿锵有力的言语，一字字一句句，都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信赖，充分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历史毕竟是人民的历史。“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

主席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的手迹,再现了李达同志和毛主席的深厚友情和亲密关系。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在李达同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颠倒过来了。1980年以后,人民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李达文集》第一、二、三、四卷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这都是李达同志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斗争的忠实记录。

综上所述,李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赤胆忠心;他坚信马列、忠于真理、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他理论联系实际、锲而不舍、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的谦逊美德,等等,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前大好形势下,我们学习和继承前贤的革命风范,就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990年9月16日完稿)

#### 注释

① 详见拙文《李达早期的爱国思想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楚晖》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详见拙文《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和《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同上,1987年第4期)。

③ 详见拙著《李达传记》第69—71页。

④⑪ 《李达自传》(1956年3月10日)。

⑤⑦ 转引1978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

⑥ 访问许德珩记录(1979年11月1日)。

⑧⑨⑬ 参见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辑。

⑩ 参见《文献》1980年第2辑。

⑫ 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杂志》,第9期(1946年10月1日)。

⑭ 访问石曼华记录(1981年5月)。

⑮ 李达:《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七一》1957年第7期。

⑯⑰ 参见《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

⑱ 参见1966年6月30日《湖北日报》。

⑲⑳ 参见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书林》1979年第2期。

㉑ 参见1978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

(本文责任编辑 郑传寅)